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及全球人口的急遽增加，土地資源開發問題已日益嚴重，密集的人口壓力導致自然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的干擾與威脅，人類過度攫取自然資源，破壞野生動植物的棲息場域，已經造成環境惡化及物種滅絕的重大危機，因此，從七〇年代開始，環境議題已成為國際社會普遍關注的焦點 (McComas et al., 2001)。在這股世界環境保育的浪潮之下，台灣亦不能置身事外，從政府陸續推動自然保護區及訂定相關的環保法規政策，以及民間團體或地方社區的自發性環境保護運動，都可以看到台灣社會已積極融入這股世界環境保育的潮流中。

傳播學者 McLuhan 曾在 1964 年提出「媒體即訊息」，並認定媒體必將對人類造成深遠的影響 (Osen, 1997)。隨著傳播科技的日新月異，地球上任何角落的人類，都居住在一個所謂媒介飽和的世界裡，媒體環繞在我們的四周，傳播科技縮短了人們之間的距離。七〇年代以降的全球環境保育思潮，正與大眾傳播媒介的運作息息相關，而絕大部分的民眾是透過大眾傳播媒介獲得環境保育訊息。以美國奧瑞崗州為例，民眾獲得政府森林資源經營訊息主要是來自於報紙，其次為電視、收音機、雜誌書籍、親朋好友及環保團體等，最後是政府部門 (Shindler et al., 1996)。Wakefield 及 Elliott (2003) 亦指出，大眾傳播媒體是民眾接收環境資訊最主要的來源管道。大眾傳媒不只在民眾形成環境意識的初期有顯著的影響，他們對於拓展民眾的環境意識及環境教育的重要功能也已獲得不少證明 (Kwamena, 2001)。黃朝恩 (1998) 認為，在推動民眾參與環保工作上，大眾傳媒無疑扮演著啟蒙者和教育者的角色。Brosius 及 Kepplinger (1990) 更發現，在能源及環境議題上，新聞報導發揮了強烈的議題設定 (agenda-setting) 功能，引領大眾對該議題的關注，媒體對環境議題的相對強調與社會大眾對此議題的突出認知有著密切相關。國內核四興建問題、墾丁龍坑油污事件及鎘米事件等，亦常是報章雜誌熱烈討論

的話題，不但促使環境保護運動的興起，也使得大眾的環保意識逐漸提高(林義晃，2003)。

地理學界在研究取徑上很早就注意到大眾傳播中報導的環境議題，並從中開始進行分析討論。McManus(2000)曾回顧相關研究後指出，五〇年代起就有地理學者探討報紙在地理教育上之應用，其後陸續有眾多地理學者投入這個領域中，他們透過報紙報導來探討許多環境議題，包括乾旱、災害、森林、土壤、聯合國環境高峰會議及開採金礦等，研究焦點則主要集中在權力論述及自然災害面向上。晚近，有更多的地理學者利用多樣的大眾傳播資料，以瞭解各種不同的地理環境現象。Bendix 及 Liebler(1999)應用報紙報導探討美國西北林區斑梟保育爭議，分析不同的距離、地理區位及地方特性在報導上之差異。McManus(2000)亦透過報紙的報導，研究澳洲社會大眾對溫室效應氣候公約的看法。Wakefield 及 Elliott(2003)則探討加拿大地方新聞報紙在工業廢棄物垃圾掩埋場環境風險資訊傳播上所扮演的角色，並建議可將分析結果作為環境影響評估參考。

大眾媒體報導不只有助於環保理念的宣導與推廣，也可反映出社會大眾對環境問題的看法與建議，因此，藉由傳播媒體的內容分析，可讓我們瞭解環保議題的變化趨勢，以及民眾對環保議題的認知與態度(Bengston et al., 1999)。然而，雖然傳播媒體具有環境教育的功能，也有助於社會大眾環保理念的提升，但是由於環境議題的本質並無法持續吸引媒體的注意，許多環境議題被時代的潮流所淹沒，在新聞版面上的空間被其它較具新聞性的事件所取代。因此，主流媒體在九〇年代以來對於環境議題的關注已經遠不如七〇及八〇年代那麼頻繁熱烈，即使有報導，也往往將複雜的環境議題予以簡化(Hansen, 1993; McManus, 2000; McComas et al., 2001; 邱育慈, 2002)。國內媒體對於環境新聞的報導正因為主流媒體對環境議題的逐漸忽視，少數持續關注環境議題媒體的存在就顯得格外重要。由公共電視新聞部製作的「我們的島」節目是國內第一個標榜以「土地關懷」及「環境正義」為製作取向的常態性新聞節目，亦是國內僅見以深度報導形式論述環境議題的電子媒體。節目從 1998 年 11 月開播至今已逾六載，內容則涵蓋了

台灣本島及外島的自然資源及環保議題，它曾獲得國內外諸多獎項肯定，也是公共電視目前存在時間最長的新聞性節目，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於環境的報導常引領同業跟進，直接或間接地促進民眾瞭解台灣環境議題的特性及重要性，並形成環境公共議題。鑑於國內關於電視環保節目的內容分析至今仍未有相關研究，本文將針對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節目的報導進行內容分析，主要的研究問題在於：(1)「我們的島」節目的環境議題取向及其時間變化為何？(2)「我們的島」節目的報導地點分布位置及其時間變化為何？(3)環境議題與報導地點的交互關係又是如何？以及(4)消息來源的取向偏重為何？本研究除了企圖瞭解上述研究問題中環境議題與報導地點的地理時空分布特性及消息來源偏向之外，將更進一步探討形構此分布特性的原因與機制，期能藉由公視「我們的島」節目的內容分析中，瞭解傳播媒體與環境議題間的關連性。

此外，媒體對於環境議題所展現的意識型態近年來也受到政治地理學者的關注，他們對環境新聞報導的研究，通常將焦點關注於權力的爭議(issue of power)，這樣的爭議包括：誰被媒體再現出來？而誰又被刻意忽視。其中最引起地理學家感興趣的是，誰有這個權力去建構這個議題？以及媒體對議題的言說結構，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被置入於更大的意識型態框架中(McManus, 2000)。如前所述，

「我們的島」對於公害的揭發與保育的關注常引領媒體同業跟進，另一方面，他們卻又較一般主流商業媒體擁有更強烈環境守護使命。「我們的島」製作群在創始初期曾強調，「以彰顯環境正義為製作理念」、「記錄台灣的大山大河，讓孕育島民的大地之母，能透過影像，找到島與島民休戚與共的情感」，並以「具濃厚的批判色彩，也正扮演著以媒體監督政府的角色」來自詡(劉楷南，1998)。相較於一般新聞從業人員強調「公正」、「客觀」的平衡報導觀點，「我們的島」製作團隊在環境議題的表現上更具批判性，亦較具有媒體第四權的氣味。

因此，本研究將透過文獻整理及深度訪談的方式，以對組織成員「重要生命經驗」的研究為取徑，試圖找尋該節目創立的背景與「環境正義觀」形成的原因，並嘗試對他們強烈的守護環境特性與新聞專業意理的扞格提出討論。此外，本文

欲透過質化的文本分析，以該節目第 217 集「斯土安康」為分析樣本，探討以標榜「環境正義」為理念的「我們的島」製作群，在涉入「安坑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議題時，如何呈現他們的觀點，又如何置「環境正義」理念於影像文本脈絡中。

隨著「地球村」時代的來臨，遠方的問題經由影像進入了我們的客廳，電視連接了地球兩端居民彼此的關懷與責任(Crang, 1998)。Moore(1993)亦曾指出，電視的便利及普及，讓人們可以停留在家中，但卻又同時經由電視去另外的地方(staying home/going places)，此特殊的時空關係，激發學術界發展出電視文化中的人文地理學新領域，尤其關心電視在認同建構及想像社區中所扮演的角色。「客廳」與全球因為電視的連接而產生了媒體地方感的論述，新媒體中的流動空間不僅連接了遠方，也造成了地方感的重新定義(Crang, 1998)。媒體地方感隨著傳播科技的日新月異已成為地理界甚或傳播界的話題。因此，本文在經由對「斯土安康」文本的拆解中，亦將探討「安坑」這個地點的圖像如何被記者所建構？它的地點意義如何再現？閱聽人透過該節目所得到的「安坑」的地方感又是什麼？藉由以上的發問對形構媒體地方圖像的權力結構提出詮釋。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綜合上述，本研究欲探討的焦點有三個層面，首先，以深度訪談方式探索「我們的島」製作群的環境觀是什麼？是否有改變？而這樣的環境觀是如何建構而成？批判性的報導言論與新聞客觀報導原則有無衝突？其次，「我們的島」六年來共 286 集的報導偏重的主題為何？其空間分布有何差異？他們所再現出的台灣土地是什麼樣貌？而又是誰掌握了媒體近用權而在節目中發聲？最後，「我們的島」如何使用影像表達他們的訴求？地方感又是如何透過媒體所再現？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如下：

- 一、以重要生命經驗的研究取徑探索「我們的島」成員環境觀的養成原因，以及其環境觀與新聞專業意理的扞格。

二、「我們的島」六年來、共 286 集報導主題與消息來源之偏向及趨勢，及其時空特性。

三、「環境正義」的環境觀如何透過影像論述呈顯，「我們的島」再現出的安坑圖像又是為何。

第三節 研究對象簡介

「我們的島」從 1998 年 11 月首次於公共電視頻道播出，起初它以「土地關懷」的面貌被介紹給觀眾，節目製作宗旨則為「帶領觀眾，看到台灣人與生活於其上的這座島之間，數十年的感情與故事」（劉楷南，1998）。1999 年，「我們的島」以第一季海洋系列節目中的「漁季不再來」獲得永續台灣報導獎第二名，製作群如此表明心跡，「台灣的環境破壞，至少可追溯到三十年前；而台灣電視媒體的發展，也已有三十幾年的歷史，可是電視媒體始終沒有負起守護環境的責任…我們十分確定這樣的節目非做不可…我們擔心我們的製作速度會趕不上環境破壞的進度…」（蘇志宗，1999）。2001 年「我們的島」進行改版，確立下列原則，「以更理性的思考來處理環境議題；用哲學和美學來探索人與自然的關係；用輕鬆靈活的技巧來帶動環境教育；透過更草根的方式來反映民眾的心聲；對政府的監督從不妥協」（蘇志宗，2001），現今「我們的島」節目分成以下三大區塊：

一、「我們的島」：保有原節目紀錄報導之特色，著重環境新聞或議題的解析，是新聞雜誌的封面故事。

二、「人與自然」：重建生態哲思與土地倫理，呈現默默為環境付出的一群人，藉由一則則發人深省的故事來引發觀眾的共鳴。

三、「看守台灣」：導入「公眾近用」的精神，提供民眾一個共同關心環境的媒體空間。

由此可看出，「我們的島」是一個以監督台灣環境為職志的深度報導性節目，十二名專職的環保記者，把鏡頭的焦點集中在台灣本島的環境問題，強調土地關懷及環保生態，他們視守護環境為媒體應負的責任。

在收視表現上，「我們的島」在第二季調整時段後平均收視率達 0.13%，主要收視觀眾年齡層為 30-40 歲的人口(佔 35%)，以工作男性為多數(佔 42%)。而半年的觸達人口約 65 萬 2 千人，觀眾的平均收看時數為 0.31 小時，節目的觀眾偏好度則在 7-8 之間。¹至於在節目的品質表現上，「我們的島」除了獲得 1999 年的永續台灣報導獎，該年並入圍「亞洲電視獎—最佳雜誌性節目」；2000 年「我們的島」得到永續台灣報導獎首獎，繼之獲得文建會主辦的「地方文化錄影帶獎」，並入選為 2000 年「台灣國際紀錄年雙年展」觀摩影片，及多次入圍金鐘獎，2004 年則受邀赴東京參展第 13 屆「地球環境映像祭」，同年得到行政院青輔會主辦的「2004 競報 NPO」媒體報導類首獎。而「我們的島」的節目錄影帶，亦是從 1999 年以來一直在公視年度「不分類銷售支數排行榜」中名列前茅，擴展了公共電視自籌經費來源(公共電視，2005)。

「我們的島」固定在每周一晚間十點播出一小時，並於周三上午十點重播。而每次的節目內容除了會先在公視全球網站予以預告外，節目並與「環境資訊電子報」及「聯合新聞網」進行策略聯盟，在節目播出的前一周，由節目文字記者撰寫該周之報導張貼於網頁上。此外，「我們的島」亦曾針對重大環境議題，例如坪林交流道公投事件及生態工法論題，舉行電視座談會，製作人亦曾多次參加環境議題座談會，以環境媒體的觀點與民眾面對面會談。

第四節 文獻回顧

一、環境正義

環境正義是近年來環境社會學中發展最迅速，運用範圍最廣泛的領域之一。它的最主要關懷是在資源逐漸匱乏、環境破壞愈來愈嚴重的今天，少數族群與弱勢團體的土地與資源被侵佔，以及他們被迫承受主流社會的各種廢棄物毒害之間

¹ 收視調查分為兩種形式，一是收視率(特定時段內收視該節目的電視數百分比)，另一則是收視質(指標有節目技術純熟度、吸引力、觀眾評價等)。公共電視每年委託聯廣行銷為公視節目做收視質調查，其中指標之一的觀眾偏好度是以 Likert 量表形式，區分 1 至 10 個等級的量表給受訪觀眾填寫，再經由加權統計計算出最後得分(陳子玖，2001)。

題(紀駿傑, 1996)。環境正義的關懷起點, 是對於「貧窮的人居住在惡劣環境」的發現(Dobson, 1998)。在 1983 年美國主計室(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所做的一項關於鄰避設施(not in my backyard, NIMBY)的調查, 發現全美有四分之三的有毒廢棄物傾倒於貧窮、黑人及拉丁裔族群的社區中, 環境正義問題才受到重視(王俊秀, 1999)。1987 年, 美國聯合基督教會種族正義委員會(United Church of Christ Commission for Racial Justice)執行長 Chavis 在全國報刊俱樂部發表環境種族主義時指出, 美國境內的少數民族社區長期以來不成比例地被選為有毒廢棄物的最終處理地點(Prout, 1999)。1980 年代末期, 美國南方所有的有毒廢物處理容量中, 有 63%是在黑人社區, 而黑人在南方只佔總人口的約 20%。就全國而言, 五個最大的商業有毒廢物處理場中, 就有三個是座落在以黑人及拉丁裔人為主的社區(紀駿傑, 1996)。當金錢向主流社會匯流時, 經濟外部性或污染產生的社會成本卻由非主流社會或弱勢族群來吸收, 而這樣的現象震驚了當時的社會大眾, 也引起了環保人士對於環境正義的呼聲。

在人文地理學辭典中, 環境正義被定義為:「一個從社會正義的觀點去表達環境訴求的社會—政治運動。它關心的範疇包括世代間的福利及權利、對於種族、性別、階級、國家的平等關懷, 甚至這些正義的權利呼求也擴及到對非人類的大自然物種。」(Johnston et al, 2003)。政治地理學者 Williams(1999)曾以不同的地理尺度(當地/國家/國際)探討政治對美國環境正義的影響, 並分析不同地理尺度的環境正義運動對政策的衝擊, 結果指出有些草根團體所進行的環境正義運動獲致相當成果, 包括不公平對待獲得改善、規劃中有毒設廠計畫被凍結及引起全國或國際間的注意。Dawson(2001)則探討後蘇維埃時代時, 拉脫維亞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及社會面向上邊緣化問題, 並分析邊緣化對區域發展及環境正義之衝擊, 他發現新的有毒廢棄物設施大都設置於少數民族居住區域, 環境歧視日益嚴重, 並擴大已開發及未開發區域間之差距。此外, 地理學者 Kurtz(2003)亦曾探討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化工廠環境正義問題; Holifield(2004)則分析美國環保署在政策上如何落實環境正義, 讓邊緣化社區能在政治上獲得權力、經濟上能自給

自足。

王俊秀(1999)以「倫理論」、「解放論」及「超越觀」三個面向進一步探討環境正義運動的理論脈絡。就「倫理論」而言，王俊秀認為，從自然權(natural right)朝向自然的權利(the rights of nature)，亦即自然權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由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c)、生命中心主義(biocentric)，而到達生態中心主義(ecocentric)，是環境正義得以透過倫理層面而彰顯的重點所在。王俊秀認為，環境正義者視世界萬物為一生命共同體(life community)，而他們看世界的角度則是以「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的視野，認為萬物皆有其自有價值(intrinsic value)，而人類只是地球社群裡的一份子。

至於「解放論」的脈絡則回歸到人類歷史所經歷的三種解放歷程，一是黑奴解放—代表社會正義的再現；殖民地解放—代表政治正義的抬頭；自然解放—則是環境正義的象徵。就倫理的觀點而言，王俊秀認為「被虐待的人」等同「被虐待的自然」，而自然的解放隱含著「自然人格化」(personhood)，例如1995年日本鹿兒島奄美大島的居民及四種瀕臨絕種的動物一起成為原告，訴請當地縣政府撤銷高爾夫球場的開發。

「超越論」則強調在思想及行動上展開逆轉—即環境社會學所謂的顛覆性(subversive)，以超越自我、超越國界及超越成長迷思。其中超越自我意謂超越自己對大自然的傲慢，體認自己只是自然界的一份子而非萬物之靈；超越國界則是對「污染沒有國界」及「國家(政府)是最大的污染源」的挑戰，而「無政府主義」及其所延伸的對抗文化則成為環境正義的化身。超越成長迷思則是對抗資本主義下不義的經濟成長模式，主張從事結構性的調整，強調發展而不成長(development without growth)。王俊秀認為，環境正義可透過一種「視窗」來檢驗環境價值，而這個視窗所強調的是生態中心主義、自然解放及超越成長迷思。

二、重要生命經驗

針對探究「我們的島」記者在建構其環境觀的過程及影響原因，或許可有許

多不同的假設，例如童年經驗、成長背景、教育背景，甚或進了團隊所產生的「團體壓力」，都是可能的原因。而環境教育學正有一支學門在對環境行動者的生命經驗有著研究興趣。

SLE(significant life experience)的研究是由一位美國環境教育學者 Thomas Tanner 於 1980 年所提出，他是要藉 SLE 的研究來瞭解，在那些環境行動者的生命歷程中，有些什麼東西造成了他們現今對環境的態度。他在論文中提到：

我請教他們是什麼樣的影響，帶領他們如此熱情地保護環境，他們總是回答我好幾個小時，有關童年時期或是青少年時期自己單獨或是和一些朋友到荒野地區遊玩的情形…我假設這些經驗或許是許多環境保護論者生命中重要的部分(黃建榮，1999)。

他認為，環境教育的終極目標在培養具有環境素養的公民，而如果我們發現了塑造那些環境行動者很重要的早期生活經驗，環境教育者可以利用這個發現，在培養公民早年的環境教育過程中複製這樣的經驗(Chawla, 1998)。

SLE 運用質性研究法，探索被研究者內心深層的認知與感受，以感性的方式說明人類的環境經驗，不僅瞭解人類做了什麼，更進一步解釋他為什麼這麼做

Tanner 早期的研究主題是影響一個人從事環境保育工作的因素，他以開放式問卷郵寄問卷給全美四個環保團體，他要被研究者採取自傳的方式，回答「生命中有哪些重要的影響造成你選擇保育工作。」研究結果最後歸結出九個因素，其中「戶外活動」及「自然地區」所佔比例最高，其次是父母及老師的影響。

與 Tanner 同期的 Peterson 是以半結構式訪談，訪問 22 位環境教育者，探討影響他們環境態度的因素。Peterson 的研究結果發現「戶外活動」和「家庭因素」是最常被提及的，與 Tanner 所做的結果相似。而 Chawla 則是近期橫跨國際的 SLE 研究者，她在 1999 年對 30 位美國及 26 位挪威的環境行動者所做的研究，被 Tanner 認為是近年來 SLE 研究的典範(李曉珊，2003)，她的研究結果如表 1-1。

國內從事 SLE 研究的論文有李曉珊(2003)的《三位花蓮環保團體領袖其環境行動養成之生命歷程探索》，她以訪談、參與觀察及文件蒐集的方式，發現影響

被研究者的生命歷程經驗有「接觸大自然的經驗」、「離鄉之後再回到故鄉的影響」等十項。羅雪瑞(2003)對 12 位國家公園解說員進行深度訪談，彙整出可能影響優秀國家公園解說員的重要生命經驗及環境素養。黃建榮(1999)探討一位本土的外籍人士—劉力學的個人環境行為，討論其保護環境的原動力及其有效行動的構成要素。

SLE 生命經驗研究是環境教育學中對那些擁有較高環境行動力的對象，探究其環境素養養成的原因的一種方法及研究取向，以 SLE 的研究觀點來探索「我們的島」的記者環境觀的建構過程，或可提出更好的解釋。

表 1-1 美國及挪威環保團體重要生命經驗(引自 Chawla, 1999)

經驗	美國 (男 20；女 10)	挪威 (男 15；女 11)	平均 (%) (男 35；女 21)
1.接觸自然的經驗	87	65	77
2.家庭			
父母親	67	61	66
其它人	13	12	13
合計	80	73	77
3.組織	53	58	55
4.負面經驗			
棲地破壞	23	23	23
輻射\污染	10	23	16
合計	33	46	39
5.教育	40	35	38
6.朋友	23	42	32
7.職業	30	23	27
8.社會正義感	23	27	25
9.書籍或作者	7	35	20
10.原則或信仰	10	19	15
11.對下一代的關心	0	8	4

三、媒體地方感

地方(place)一直是地理學界關注的話題。在英語社會中，「place」這個字彙的意義相當廣泛，它可以被解釋成一個位置(location)、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或是一個人對一個地點，像是房間、辦公室，或是家鄉的感受。而在地理學者的

視野裡，一個人與一個有範圍的地理場所產生關聯，即彰顯了地方的意義：它可以是一個人經常走過的區域，像是城市、鄉鎮和市郊、小村莊或小島，甚或大到一個郡(Hay, 1998)。基於這樣的認識，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意義於焉彰顯：如果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居住多年，特別是如果他出生於此，他通常就會發展出對該地的地方感，他在那裡有家的歸屬感與安全感，感覺自己是屬於那地方的，並對那裡的認同產生了聯繫(Hay, 1998)。

地理學界對地方感的研究受現象學(phenomenology)的影響很深，其中又以人本主義地理學界的研究為多，如段義孚將地方感與個人經驗、地方愛作聯結，強調地方感是因為對一個地方的心理需求而自然發生(Johnston, 1991)。然而，在 20 世紀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浪潮下，大眾傳播科技的盛行讓閱聽人得以在自家的客廳中得知世界上各個角落發生的事，一個從未到過的地方的影像，也輕易地透過電視等媒體傳送進閱聽人的腦海，於是傳統地方感有了新的詮釋。

Meyrowitz(1985)就指出，電子媒體改變了人們的地方感，人們因為科技的進步創造出一種新的社會關係，人與人不需要再倚賴實際的碰面而發生或維繫感情，也不需要非得踏進一個地方，才對該地產生情感及認同。Meyrowitz(1985)認為這樣的傳播科技衝擊著社會關係改變，會使人們喪失對地方的經驗感情，形成無地方感(no sense of place)。

Rantanen(2003)則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地方感的詮釋，他認為隨著電子媒體的問世，一種「閱聽人的地方感」(reader's sense of place)即被創造出。閱聽人不但沒有因為全球化而喪失地方感，反而對其它地方有更多的知覺，獲致一種新的地方感(new sense of place)。從無地方感到新的地方感形成，關鍵在於傳受雙方已不再分別侷限於傳播的兩端，互動式科技的發展，使得媒體不再只是居間傳介，反而造就嶄新的空間，促成新的空間意識(沈錦惠，2003)。有別於 Harvey(1989)的時空收斂(time-space compression)及 Giddens(1990)的時空分離(time-space distancing)論述，Rantanen(2003)認為在現代化過程中，大眾傳播媒體在報導新聞時提供了一個認同的觀點給閱聽人，這種認同的賦予讓閱聽人在同一時間存在

於兩地成為可能，並且強化了他們對該地的地方感。

媒體可以「再現」(represent)出一個地方的地方圖像，然而，不是所有媒體的「再現」都與實際地點的情況相符。Bushman(1997)就指出，有許多地理學者陸續關注電影工業及大眾傳媒對於異國地方文化的再現，並且著手於媒體對於地景的扭曲(distortions)的研究，例如 Myers 等(1996)分析美國媒體對於盧安達內戰的報導內容，發現他們引用的消息來源全是非非洲人，並且扭曲該事件成為一個無時間(timeless)及無地點(placeless)的部落糾紛，盧安達在美國文化下被置放為「他者」(others)。Pauly 及 Eckert(2002)更指出，在近兩世紀來，新聞報導幫助人們創造或維持了對「地方」的感覺，新聞組織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控制了「地方」的意義，報紙對地方的概念與一種排除和偏見的系統(a system of exclusions and prejudices)密不可分，記者會因為經濟上的考量而擇取消息來源對象，而他們對於地方的概念，並不是在報導中將社區中所有人都包含在內，藉著意識型態的運作，媒介會引用某些團體的觀點而忽略另一些團體的觀點，再現出地方的圖像。鄭玉惠(2000)進一步指出地方感與權力結構的關係，她認為經濟再結構下的空間生產有不同的權力關係，各個權力結構對地方的印象或發展有不同的詮釋或意見，地方感於是在權力結構的論述中被建構出來。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消息來源(權力結構)可以影響記者建構一個地方的圖像，在權力拉扯的場域中，誰的地方感能居主宰地位，誰的論述就顯得有力，而這樣強勢論述的地方感經過大眾傳播媒體「再現」給閱聽人，使觀眾不必與該地方有經驗上的聯繫，接收媒體再現出的地方圖像，甚至對強勢論述產生認同，建構或強化了閱聽人(非在地居民)對這個地方的地方感。

第五節 研究方法

針對文本的部分，本研究採取內容分析、論述分析及符號學原理的耙梳，以尋求報導文本中所隱含的內顯意義。至於記者環境觀的建構則採用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法。訪問的對象為「我們的島」現職十二名記者、一名已離職記者、一名

現職執行製作、一名現職製作人，及節目創始人兩人，參與觀察的時間則為 2004 年 7 月，研究者以實習生的身份參與團隊的公開會議、私下討論及製播的過程。

一、內容分析

內容分析法是使用一種傳統的、描述性的手段，來界定傳播的內容是什麼，它的好處是可以發現在長時間中變化的趨勢，並且用系統、客觀以及定量的方法去測量媒體的內容變化(Wimmer and Dominick, 1997)。Bos 及 Tarnai(1999)亦指出，有別於社會科學其他研究方法如問卷調查、深度訪談及實地觀察，內容分析法可讓我們從文本中去探討其中所包含的量化及質化特性，並可經由符號編碼方式，將研究文本內容分類量化、計算其頻度，或是研究文本所隱含的意義，以進一步加以說明及詮釋，而其基本假設是所有不同的文化型式均能在文本中呈現出來，透過內容分析以瞭解其社會真實性。許禎元(2003)曾指出，內容分析是以傳播內容的變化來推論質的差異，研究者可視實際需要選擇量或質的取向進行探討。由於內容分析發展歷程已久，為了配合研究目的所需，內容分析法在研究取徑上也衍生出許多不同的分析技術及流程(Ahuvia, 2001)。

內容分析法發展至今已被廣泛地應用於環境保育相關研究領域中。在國外方面，Bengston 等(1999)以內容分析探討美國報紙、電視及廣播中民眾對自然資源經營的看法，並研究不同的地理區位民眾看法的差異。Dasgupta 等(2000)曾比較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及菲律賓等開發中國家其傳播媒體在環境新聞報導上的差異，並探討環保事件與媒體報導的關連性。McComas 等(2001)也以內容分析法，探討美國電視節目中所包含的環境主題及其變化趨勢。在國內方面，劉人和(1999)曾以新版國中生物教科書為分析樣本，經由內容分析法以瞭解書中生態學相關概念、名詞定義、教材內容陳述方式及圖例的適宜性等。張子超(2002)亦採用內容分析法，探討教育部頒布的九年一貫課程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綱要中的環境價值內涵，發現部份項目都有環境價值教學切入的機會。此外，熊傳慧(1984)、趙寧(1992)、黃朝恩(1998)、任憶安等(2000)及林義晃(2003)等均曾以國內主要的新聞報紙作為研究對象，探討環境報導中的主要議題及變化趨勢。

為了瞭解公視「我們的島」節目長期以來的報導重點及趨勢，本文採用內容分析法作為研究取徑。傳統上最簡化的內容分析流程可區分為三步驟：(1)選擇分析材料；(2)將研究文本進行編碼；(3)詮釋編碼結果(Ahuvia, 2001)。不過隨著時間的演變，內容分析技術及流程也日益多樣，研究時應該依據研究所需而採取最適宜的分析方式。由於本文研究重點在於探討公視「我們的島」節目環境議題的地理時空分布特性，必須以系統性的量化方式，全面登錄每一單元的報導主題及報導地點，因此，本文採用 Bos 及 Tarnai(1999)所建立的經驗式內容分析(empirical content analysis)流程作為基礎，依序進行分析。該流程將內容分析區分為五個步驟：(1)理論層級；(2)建立類別；(3)預試；(4)資料收集及評估；(5)結果詮釋，詳細流程如圖 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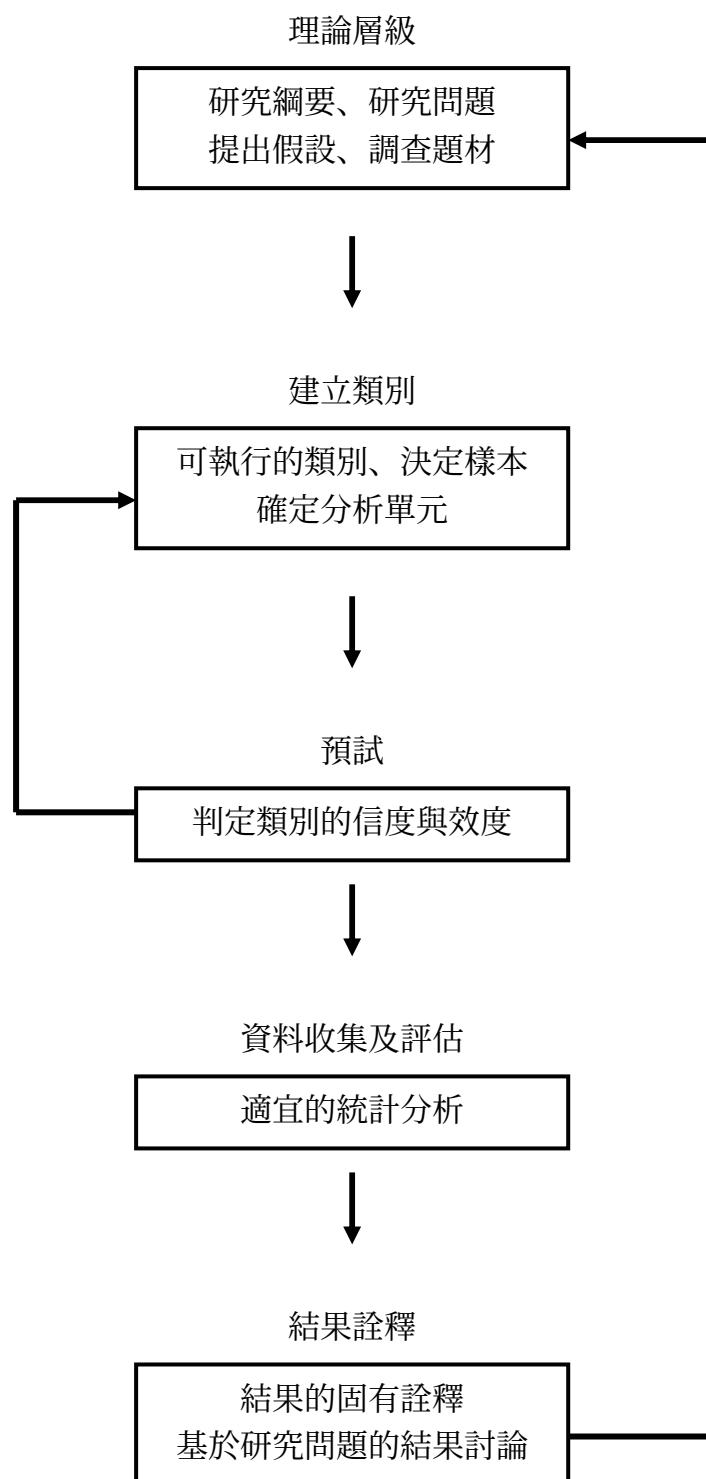


圖 1-1 內容分析法流程(Bos and Tarnai, 1999)

(一) 理論層級

進行內容分析的第一步驟應先確定研究綱要與問題意識，透過文獻回顧建立

理論基礎後進而提出研究假設，並選取適宜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材料。前文已簡要介紹研究動機、研究問題及文獻回顧，並說明選擇公視「我們的島」節目作為研究材料的原因，至於研究方法的理論架構則是以 Bos 及 Tarnai(1999)的研究作為基礎。

(二) 建立類別

本研究選取公視「我們的島」從 1998 年 11 月開播以來至 2004 年 12 月底止，共 286 集、593 個單元作為分析樣本，各年度所包含的影集數、單元數及總時數如表 1-2 所示。一般而言，如果研究的題材內容甚多，則可以隨機取樣方式選取適當的樣本數及單元數，以減輕分析工作在時間及金錢上的負擔(Bengston et al., 1999)，甚至只針對特定的時段或主題進行內容分析(McComas et al., 2001; Sumpradit et al., 2004)。由於公視「我們的島」節目開播不久，影集數及單元數並未過多，所以本研究沒有再進行取樣工作，而是以全面登錄及量化的方式進行分析，登錄內容包括環境議題及報導地點。分析樣本及單元確立後，即須建立研究類別(category)，建立類別是內容分析的基礎架構，後續的分析論述都與此分類方式密切相關(Sheppard and Bawden, 1997)。在環境議題分類上，本研究參考黃朝恩(1998)的分類方式，將環境議題區分為污染類、保育類、天災類及其它等四大類別。在報導地點分類上，本研究則依據台灣習慣的地理分區概念將其分為台灣北部、中部、南部、東部及其它等五大類別。

由於主要類別範圍常過於廣泛，因此，將類別再細分為次類別(sub-category)是一可行方式(Ferguson et al., 2003; Sheppard and Bawden, 1997)。本研究將環境議題四大類別再細分為若干的次類別，其中污染類再細分為空氣污染、噪音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廢棄物處理及醫藥衛生等 6 個次類別，保育類再細分為動植物保育、森林生態保育、淡水資源保育、海洋資源保育、溼地保育、地景保育、水土保持、能源議題、環保科技及環境教育等 10 個次類別，天災類再細分為水患、土石流、地震災害、生物災害及氣候變遷等 5 個次類別，其它類則再細分環境相關及人文相關等 2 個次類別，合計共 23 個次類別。在報導地點五大類

別上，本研究依行政區域將台灣北部再細分為基隆、台北(市)、桃園、新竹(市)及苗栗等 5 個次類別，台灣中部再細分為台中(市)、南投及彰化等 3 個次類別，台灣南部再細分為雲林、嘉義(市)、台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等 5 個次類別，台灣東部再細分為宜蘭、花蓮及台東等 3 個次類別，其它類則再細分澎湖、金馬及國外等 3 個次類別，合計共 19 個次類別。

由於公視「我們的島」節目每一單元皆為深度報導形式，探討的議題往往不止一個面向，因此，本研究並非以一個單元分為單一類別，而是依據報導內容的多樣性，將一單元對應到多個不同的次類別中，對報導地點的登錄亦然，此種計算方式可較精確表達「我們的島」深度報導節目的內涵。

表 1-2 各年度分析的影集數、單元數及總時數統計

年度	影集數	單元數	總時數	說明
1999	43	38	20.5	一集為一單元，1-20 集為每集 30 分鐘，21-43 集為每集 60 分鐘，共有 5 集重播，故單元數計算為 38，此外，1-8 集為 1998 年播出，納入 1999 年計算
2000	46	46	23	一集為一單元，每集 30 分鐘
2001	49	125	47.5	90-92 集為一集一單元，每集 30 分鐘，93-138 集為一集 1 至 4 個單元不等，每集 60 分鐘
2002	51	137	51	一集 1 至 4 個單元不等，每集 60 分鐘
2003	46	128	46	一集 1 至 4 個單元不等，每集 60 分鐘
2004	51	119	51	一集 1 至 4 個單元不等，每集 60 分鐘
總計	286	593	239	

(三) 預試

傳統上內容分析的登錄分類工作是由編碼員(coder)來操作，經過相關說明及訓練後開始進行預試(pretest)。一般而言，預試樣本數約為總樣本的 10%，經由編碼員各自判定分類後，再核對結果的信度與效度，藉由觀測同意度(observation agreement, OA)、Kappa K 指標、Scott's π 係數或卡方檢定等作為判斷依據，當觀測同意度高於 85%、Kappa K 指標大於 0.60、Scott's π 係數高於 0.70 或卡方檢定沒有呈現顯著差異($p=0.05$)時，表示編碼員具有相當高的正確性與一致性，可以開始進行登錄分類工作(McComas et al., 2001; Ferguson et al., 2003; Greer, 2004;

Wallace and Leenders, 2004)。若預試結果欠佳，則編碼員應再加強訓練，或是重新檢視調整分類方式，直到預試結果符合要求為止。雖然透過編碼員進行登錄分類工作具有省時省錢功效，但分類的品質卻常因人而異，因此，Ahuvia(2001)在其提出的詮釋式內容分析法(interpretive content analysis)中指出，由多位編碼員(必須包括研究者本身)共同合作進行登錄分類工作，將比單一編碼員的分類結果為佳。Babbie 也認為，由督導者(supervisor)去複證編碼員的分類結果將可提高分類結果的信度(李美華等譯，1998)。本研究包含研究者在內共有三位編碼員，先以共同合作方式讓編碼員能清楚瞭解登錄分類依據，能正確地將文本分別歸納在環境議題的 23 個次類別及報導地點的 19 個次類別中，之後再由其中兩位編碼員分別進行其它文本的登錄分類工作，最後再由研究者將分類結果進行全面複證工作，以確保分類的正確性與一致性。

(四) 資料收集及評估

為了瞭解公視「我們的島」節目的製作過程及運作狀況，並收集相關文獻及過去的影集資料，研究者以實習生身份於 2004 年 7 月至公視「我們的島」節目實習一個月，除了隨隊實地參與內外作業流程外，並針對節目相關成員進行深度訪談，以非結構式訪談法共訪談 17 人，包括 14 名製作群成員、1 名離職記者及 2 位創始人。李美華(2003)曾指出，為了能更深入瞭解新聞產製過程，可透過深度訪談收集資料以補內容分析法之不足。

McComas 等(2001)探討電視節目中的環境內容時曾指出，進行內容分析時可將環境內容給予不同等級，例如由 0 至 3 表示不同評價(0=完全沒有出現；1=有出現但不多；2=非常明顯；3=非常傑出或是節目焦點)。Bos 及 Tarnai(1999)亦指出，內容分析不只是計算單元的頻度而已，還可比較單元間的價值、重要性及強度等，不過由於這些特性不易量化，所以也可以將其視為同等值。本研究在環境議題及報導地點編碼作業上，都以同等值視之，在文本中若有出現則將其歸類至次類別中並計為 1 次，最後再加總進行頻度分析。在統計分析方面，本研究以敘述性統計為主。

(五) 結果詮釋

內容分析後的研究結果在詮釋說明上必須要回應一開始進行研究時所設立的問題意識，針對研究問題逐一解釋討論，若有需要甚至應該修正理論架構。本研究的結果詮釋部份將在第三章予以討論。

二、文本分析

本文以公視「我們的島」第 217 集「斯土安康」為分析樣本，意圖拆解其中記者所隱藏的意識型態及觀點，並試圖論述「新店安坑」被該節目所形塑出的地方感為何。選擇「斯土安康」作為樣本分析的理由如下：(1)「斯土安康」的故事背景是關於新店安康居民反對鄰避設施(掩埋場)進入的抗爭，符合本研究探索「我們的島」如何呈現「環境正義」觀的需求；(2)「斯土安康」總長 40 分 50 秒，一個單元就佔掉一集近八成的時間，且安坑議題在節目中先後出現兩次，加上在此單元製作過程中，製作人違反常態陪同記者前往採訪，在在顯示出此議題的複雜性及「我們的島」對此議題的重視程度；(3)「斯土安康」在播出後曾引起受訪對象及觀眾關於節目公正性的質疑，也代表著在整個影片成像的過程中，確實存在權力不均等的關係。

在樣本拆解的分析手法上，Jensen 及 Jankowski(1991)彙整了兩種取徑作為大眾傳播研究中質化分析的方法，一種是以批判語意學(critical linguistics)為背景的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這適合用來拆解大眾傳媒中記者所引用的、以及記者自身的言說，存在什麼隱而未見的觀點。另外一種則是符號學(semiology)取徑，這可適用於拆解記者的影像攝取及運鏡手法所欲傳達出的想法或意識型態。而本文以深度報導之電視節目為分析樣本，關於影片中文字言說的部份正可運用論述分析，而運鏡手法、聲音、影像等元素的拆解，則運用符號學取徑。

(一)論述分析

論述(discourse)，指的是一系列意義、隱喻、再現與陳述，以特定方式與角

度呈現事物的被描述圖像，並與日常生活的社會結構與實踐緊密扣合(徐美苓及丁智音，2004)。蘇峰山(2004)從 discourse 的原始字義—「來回跑動的過程」探究其所衍生出的意義，而定義論述為：「論理、交談(之進程)，以及論理交談所呈現的具體形式內容(一段談話、一篇文章)，其關鍵乃在於語言文字成為獲得理論、溝通的工具，藉由語言運用形成意義往返運動的過程。因此，論述這個概念，可以引申為兩個人之間的交談、多人之間的交談、授課、演講…乃至於大眾傳播的形式與過程。

把論述分析應用到公共論述，運用語言學知識以投入媒介文本研究的，首推 Roger Fowler(倪炎元，1999)。他在 1979 年提出批判語言學的概念，他的分析焦點集中在公共論述中所隱含的意識型態符碼，並且揭露這些符碼的語言分析策略。在 1991 年出版的『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中，Fowler 提出了幾種批判語言學的分析方法，包括動詞的及物性分析(transitivity analysis)、句法分析(syntax analysis)、詞彙分析(lexicon analysis)、情態動詞分析(modality analysis)等(Fowler, 1991)。Fowler 也強調主動語態和被動語態之間的意義差別，他認為，在句子的主動語態中，居主詞位置的名詞或片語有其責任歸屬，而被動語氣常常將這種責任歸屬給淡化，尤其轉換到賓語位置的參與者往往被省略(倪炎元，1999)。例如，「美國攻打伊拉克」，美國在這個句子中居主詞地位，若將這句話改寫成「伊拉克遭攻打」，則把攻打伊拉克的主詞(美國)給巧妙地省略、淡化掉。而這種語言特徵 Fowler 稱之為轉換性(transitivity)。

戴育賢(1994)曾使用 Fowler 的論述分析法拆解晚間電視新聞中關於「初二回娘家」的報導，他發現這篇報導中的最後一段中記者隱藏了行動者主詞，而這段言說的主詞其實是記者本身。另外，他發現在敘述語氣的使用上，男性的論述具有威權的語氣特徵，而女性的論述，則是不確定的臆測語氣。男性中心的婚姻家庭制度獲得巨細靡遺，但又不著痕跡的正當化。

另一個把論述分析運用在新聞文本上的學者是阿姆斯特丹大學話語研究教授 Teun A. Van Dijk。他認為，我們所有的社經知識及對世界的認識，大都是來自

我們每天接觸的新聞報導，除了每天的交談之外，似乎沒有其它管道比得上新聞報紙或電視，使我們涉入地如此頻繁。因此，我們必須細部檢視新聞媒體的結構 (Van Dijk, 1991)。

Van Dijk 致力把他發展出來的論述分析途徑應用在新聞媒體，尤其是報紙新聞的意識型態分析上。他對新聞的分析焦點有三個面向，一是新聞的結構，其次是新聞的製作，再來是新聞的理解 (Van Dijk, 1988)。在這三個面向中，與本文有直接關係的是新聞結構的研究中關於局部結構(微觀)的分析，在局部結構的分析策略方面，Van Dijk 承襲語言學的傳統，強調運用語法學及語意學。其中語法學研究的是哪種語法範疇所組成的句子形式是有規律的，而語意學則論及詞彙、句子和話語的意義 (Van Dijk, 1988)。它的主要分析單元為新聞論述中的個別命題，而分析的進路主要是檢視個別字彙與語句的策略性意義 (strategic meaning)、功能以及語句間的關聯，同時也檢視其意義背後相關修辭與風格 (stylistic) 的操作，以探究文本中隱而不顯的意涵 (implication)，如意有他指的預設 (presupposition)、模糊焦點的含混 (vagueness)，以及提供過多或不相干資訊的過度表述 (over completeness) 等 (倪炎元, 1999)。

Van Dijk 對意涵 (implication) 的分析十分重視，他認為，在對新聞的批判分析中，意涵是最有力的語意學概念之一。大部分文本資訊都不以明確的方式表達，而是採取暗示。分析這些文本中「沒說出來的」，比分析「實際表達出的分」，還具有啟發性 (Van Dijk, 1991)。Van Dijk 舉例，在新聞報導中，曾描述示威群眾「分乘高級遊覽車，陸續抵達示威現場」，這在暗示這些示威者和勞工根本是在浪費錢。再談到風格與修辭，當記者使用「暴民」 (mob)、「煽動份子」 (rentamob) 等字眼，而不用「群眾」 (crowd) 或「示威運動者」 (demonstrator) 等字眼時，可以被解釋成記者對他們所抱持的意識形態的一種符號，刻意敗壞那些左翼份子的名聲；同樣的方法，他們也使用「狂吠」 (howling)、「尖叫」 (screaming)、「憤怒」 (fury) 等字眼，而不會用「精力旺盛地抗議」 (vigorously protesting) 等用詞。

(二)符號學取徑

要研究是什麼使得文字、圖像或聲音能變成訊息，就必須研究符號，而研究符號和符號的運作的學問就是符號學(semiology or semiotics)。一般而言，符號學有三大研究領域：符號本身、組成符號所依據的符碼或符號系統，以及符號或符碼運作所依之文化(張錦華等譯，2001)。

符號學之探究重點在於：符號(sign)概念的意涵。關於符號概念，符號學之父 Saussure 提及了兩個名詞，也就是意符(signifier)及意旨(signified)，符號＝意符＋意旨，他認為意符指的是「聲音－形象」(sound-image)，而意旨指的是人的心理概念(mental concept)，簡單來說，Saussure 所認為的符號即是「符號＝意符(符號具)＋意旨(符號義)」(許如婷，2000)，而符號具與符號義之間沒有必然的關係存在，它們的關係是由社會慣例、法則或約定而來的。之後關於符號學的研究則傾向轉喻(metonymy)及隱喻(metaphor)的概念探討。

Berger 曾就影像的符號學分析提出一些定義(黃新生譯，1992)，他把鏡頭的類別所表達的意義作了以下分類：

符號具(鏡頭)	定義	符號義(意義)
特寫	臉部	親密
中景	大半身	個人關係
遠景	背景與演員	環境、範圍、距離
全景	整個人體	社會關係

攝影機的操作與剪輯技巧則有：

符號具	定義	符號義(意義)
仰拍	攝影機從下往上拍	權力、威嚴
俯拍	攝影機由上往下拍	渺小、微弱
溶入	攝影機鏡頭移近	注意、集中
淡入	影像漸顯於螢幕	開始
淡出	影像漸消失於螢幕	結束
切	從影像跳接另一影像	即時、興奮
拭消	影像拭消於螢幕	強行終止

此外，Field(1988)也提出了質性的影像內容分析應注意的要項，包括記者或受訪者的聲調起伏、說話的速度快慢，他們的臉部表情等。符號學理論提供了一

種有助於確定傳媒內容的「文化意義」的途徑，它對於開發存在於本文表層下面的各層意義，具有特殊的用途。總而言之，質性的分析方法應同時關注到言說及影音的分析途徑，而本文即針對「斯士安康」的影像文本，以論述分析及符號學之途徑進行解構。

在此要說明的是，以影片的分析模式而言，用文字表達電視節目中連貫相承的語言和影像，有些限制是無法克服的(Williams, 2003)，傳播學界中對於影像訴諸於文字的分析並無一定的典範。Williams(2003)曾以流程分析(analysis of flow)拆解 BBC 晚間新聞，他以新聞中出現的人物順序加以編號，並在其後述寫其發言之內容，中間再穿插簡短的影像描述。Field(1988)則以表格的方式書寫影片內容，將影部(visual)、腳本(script)、發言人(speaker)、文本種類(text categories)分開，分別描述。而國內關於電視新聞拆解的研究多是引用類似 Field(1988)的手法，將影片分為聲部及影部(戴育賢，1994；許如婷，2000；陳右果，2004)。本研究運用論述分析拆解記者的旁白以及消息來源的談話(聲部)，並以符號學取徑找尋記者取鏡、影像呈現、聲音運用(影部)所隱藏的意識型態，在考量到避免聲／影多元並進而呈顯雜亂的陳述方式，及兼顧不同的敘事元素應適當地對應至不同解構方法，以及影像及聲部關聯性的對比可能，因此選用聲部／影部分開描述的方式承接影像敘事。

三、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

為補全內容分析法之不足，及為探索更貼近真實的「我們的島」所呈顯的環境觀，本研究以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以為輔助研究工具，企圖瞭解「我們的島」製作群環境觀之養成經驗及與新聞客觀原理的互現。

依據陳向明(2004)的分類，訪談的類型可分為結構型、非結構型及半結構型，在結構型訪談中，研究者以事先設計好了的、具有固定結構的統一問卷進行訪談，對訪談的走向及步驟起主導作用；非結構型訪談亦稱開放型訪談，研究者鼓勵受訪者用自己的語言發表自己的看法，研究者關心的是受訪者認為重要的問題及他們看待問題的態度；半結構式訪談中，研究者事先備有一個粗線條的訪談

提綱，而提綱只是一種提示，訪談者在提問的同時鼓勵受訪者提出自己的問題。本研究欲以內容分析所得的結果為主軸，輔以對製作群的深度訪談來加以印證其環境觀，因此在已有先備基礎的情況下不宜採取非結構式訪談，而又鑑於結構性訪談的提問常會因研究者的偏見而忽略掉關鍵資訊，因此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並以實際情況對訪談的順序和內容進行調整。受訪者基本資料參見表 1-3。

Wimmer 及 Dominick(1997)認為深度訪談適合用在樣本數比較小的研究對象上，而且研究者利用長時間的，類似參與式的訪談方式，可以得到更豐富的研究資料。陳向明(2004)則認為，研究者在訪談開始之前必須做些準備工作，其中包括建立訪談關係。因此，研究者利用 2004 年 7 月於公視「我們的島」擔任實習生的機會熟悉研究對象，深度訪談的時間則選在實習的最後一個禮拜。

參與觀察的實施亦是在研究者擔任「我們的島」實習生一個月的時間，實地參與節目的製播、記者赴外採訪、組內會議等方式進行。觀察的重點有：記者找尋議題的管道、記者與記者、記者與製作人間對議題的討論、記者與消息來源的互動及最後影像呈現的方式等。

表 1-3 受訪者基本資料

代號	性別	備註
A	男	我們的島創始人、獨立影像工作者
B	男	我們的島創始人、環境影像記錄者
C	女	我們的島製作人
D	男	我們的島攝影記者
E	男	我們的島攝影記者
F	男	我們的島攝影記者
G	男	我們的島攝影記者
H	男	我們的島攝影記者
I	男	我們的島攝影記者
J	女	我們的島文字記者
K	女	我們的島文字記者
L	女	我們的島文字記者
M	男	我們的島文字記者
N	女	我們的島文字記者
O	女	我們的島文字記者
P	女	我們的島執行製作
Q	女	我們的島離職文字記者

四、章節安排

接下來一章，本研究將以深度訪談及資料搜集的方法，回顧「我們的島」創製的歷史及當時的產製環境，並進一步闡釋其六年來演變的歷程。再以「重要生命經驗」的研究取向，討論「我們的島」製作群成長經驗，以理解「我們的島」製作群所隱含環境觀的形成原因。

在第三章，本研究以量化的內容分析手法，探討「我們的島」六年來報導主題的偏向及變遷，解析其數據及意義，將有助於窺視「我們的島」關注議題的全貌。此外，在此章節中將指出「我們的島」六年來報導主題的空間差異，以解釋台灣環境問題在過去六年中的空間特性。最後消息來源比重的分析，將進一步釐清「我們的島」是為誰發聲的場域。

第四章部分，本研究將以「論述分析」及「符號學取徑」為文本分析策略，並以「斯土安康」為分析樣本，拆解該集的影像及口白，探究出鑲嵌其中的「環境正義觀」是如何呈現，又「安坑」地方的圖像是如何被再現。

第五章則是結論與建議，藉由本研究的發現，提供總結的研究心得，並提出未來可繼續討論的空間以及研究者的自省。